

文
学
的
还
原

翟永明 / 著

文
学
的
还
原

翟永明／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大连 ·

©翟永明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还原/翟永明著.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52-0700-6

I. ①文… II. ①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6356 号

出 版 人:程培杰

责任编辑:王 钢

责任校对:刘长影 曲颖慧

装帧设计:李小曼

出 版 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网 址:<http://www.lnnup.net>

邮 编:116029

营销电话:(0411)84206854 84215261

印 刷 者: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170mm×230mm

印 张:13.25

字 数:260 千字

出版时间: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52-0700-6

定 价:28.00 元

本书由
辽宁师范大学
学术专著资助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BENSHUYOU
LIAONINGSHIFANDAXUE
XUESHUZHUANZHUZIZHUCHUBANJIN
ZIZHUCHUBAN

目 录

第一辑

逼近与还原

- 人文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文学史重构 1

历史洪流中的遗憾与尴尬

- 试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局限 9

- 文学的社会承担和“底层写作” 17

- 大众文化时代的学院批评 21

成长·性别·父权制

- 兼论女性成长小说 27

启蒙中的两性关系

- 从《伤逝》谈起 35

第二辑

极端内倾与情感迸泻

- 路翎小说心理描写研究 41

- 路翎小说心理描写技巧初探 51

- 试论鲁迅精神对路翎小说心理描写的影响 59

- 试论外国文学对路翎小说心理描写的影响 64

情理相悖与现实主义的缺损

- 赵树理小说创作得失谈 69

《伤逝》研究综述 74

升腾在乡村大地的精魂

- 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综论 82

城乡抉择的焦虑及其想象性解决

- 丁玲《阿毛姑娘》再解读 91

完美阐释的欲望与阐释限度的反思

- 萧红《呼兰河传》的再解读 97

“两极化”叙事中的张力显现

- 陈映真《将军族》解析 106

第三辑

“意守世间的精神难点”

- 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简论 110

穿透生命表象的价值追问与诗意传达

- 评李锐的《无风之树》 117

沉闷中的呐喊

- 杨争光小说综论 127

海男《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意蕴分析 137

“镶满镜子的走廊”

- 谈于晓威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144

悬于半空的虚构

- 读鬼金的小说 152

身份确认的危机与个体命运的荒诞

- 评陈昌平的《复辟》 159

生态视阈中的诗性言说

- 评孙书林的长篇小说《光环》 162

生存困境中的焦虑与宿命

- 沙里途长篇小说《龟裂》解读 166

第四辑

浅析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内涵	169
试论儿童文学形象塑造中游戏精神的体现	177
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境遇	183
试论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意义	
——兼谈与教育主义的关系	190
论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创作中的游戏精神	197
论儿童文学中教育主义与游戏精神的关系	
——以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的创作为例	203
后 记	207

第一辑

逼近与还原

——人文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文学史重构

文学是人学,这在学界已是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表明,“文学的存在方式最终取决于人的存在方式,文学艺术领域任何根本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人的理解,任何文化都必然表现出创造者对自我的认识。人们按照何种方式生存与审美,必然与如何认识自己相一致。因此,文学人物的一切活动事实上必须以人性为依据”^①。从宏观的角度看,人性是文学的内核,整个文学的发展就是对人性的探讨,从文学的出现到现在,文学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探讨人的性格,描写人的情绪,研究人的内心,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无一不以提示人性为矢的。正是因为优秀文学作品这种对人本性的恒久表达,才使我们能够穿越久远的历史时空去领略当时人们的情感与心理状态,在共鸣中实现情感的微妙对接。所以文学作品必须关注人类心灵的隐秘世界,对道德心灵问题进行永恒的探求,实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这也是文学创作不可推卸的使命。

文学的表达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这里的人自然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富含情感的个体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②,”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③。歌德也曾说,人是一个丰富的统一体,是一种“单一的杂多”。正是这种“单一的杂多”决定了人性构成的复杂,使研究者们在一面

① 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第1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0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③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0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对这一话题的时候小心翼翼,不敢妄下断言。但问题并不能因为回避而得以解决,究其本质,人性的构成应以自然性和社会性为两大支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天生是社会动物”^①,自然性包括嫉妒、宿命、复仇、性爱、友谊、亲情、好奇、贪欲等等,满足人的自然性的诉求是符合人的本质的。但由于人的欲望的扩展能力与现实物质基础的不平衡,使社会性规范力量的存在成为一种必然,它会对人类天性进行某种理性抑制,这直接导致了二者之间深刻的矛盾。但是自然性和社会性在人性两极间永不停歇的矛盾运动以及力量的消长沉浮,不仅给特定历史阶段文化心理的定位提供了明晰的坐标,同时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可以说,文学艺术永不褪色的青春即来源于永远骚动不安、变化不定的人性,来源于人类的永恒追求。而二者要达到平衡的和谐状态,前提应是“以自然性为不可动摇之基础,以合乎历史发展的社会性对自然性‘度’的控制,并以历史变更性为当然内容”^②,即以自然性为本,社会性为从,社会性根植于自然性,并为自然性服务。但是,综观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人性表达,虽然自然性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性的冲击,但社会性对自然性的压抑是人性表现的主要情态,这种遮蔽使中国文学史上人(或曰个人)的缺失相当普遍,作为人性核心的个体价值必须依附社会价值才能被承认,意义才能兑现,个体独立价值缺乏思想理论支撑,导致文学中个性光芒的黯淡。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社会性要求对人本性的过度压抑,与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话语情境有着莫大的关系。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就已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腐朽黑暗的统治,动荡不安的局势,外国势力的入侵,都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救亡图存成了压倒一切的真理。大批作家在紧迫的救亡任务面前无法再保持一种较为宽松的心境去观察人的心理状态,而是怀着蓬勃的激情投入到救亡的洪流中,他们或以笔为枪,或干脆投笔从戎,参加实际战斗,或呼号,或哀叹,或激愤,但都表达了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强盛。不可否认,这是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这种合理性原则却掩盖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即对个体情感的漠视,个体生命存在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63 页,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

② 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第 24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

义日趋消融于群体利益之中,而这一过程的进展又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几乎是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形下进行的。当然,一些目光敏锐、有较深文学修养的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强大的历史要求面前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这种功利性表达的缝隙中寻求对人生命本体情感心灵的关注。在这种历史情势下,作家们的视野大受限制,许多作家为了达到宣传或启蒙的目的,在作品中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功利性的强化导致艺术锤炼的不足,作品的艺术性大受折损,甚至有的作品流于公式化、概念化,内涵意蕴多浮动在浅显的宣传教育层次,而未潜入更深的审美本体中,导致文本很难超越特定的先验性理念的统摄而具有永恒性的品格。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命定。中国作家并不缺乏创作的天分,只是在这种紧张的外部对抗中无法实现自己来源于生命本体的观察,这是历史的二律悖反定律在中国作家身上打下的鲜明印记。

文学创作上对人自然本性的忽视同样表现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在文学批评界,人文价值导向并不明晰,人文空气淡薄,而这必将给文学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人本位的文学研究工作应是文学研究的核心,正如钱理群所说:“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过作家的作品研究社会、历史上的人)吗?不理解人,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①所以人性理论应融入文学批评的角角落落,并成为各种文学批评的终极依据。从本质上讲,追求人性也就是追求批评标准的合理性与稳定性,“批评的问题,仍以一则故事或一部小说对人类的情况是否言之有趣或紧要为先决条件。……他们的任务,不仅在使我们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而且在使我们相信这些故事对人性的了解有无重要性”^②。应该说,人性研究是带动文学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只有在对文本人文倾向的加倍关注中,我们才能更加迫近对象本身,揭示出被历史迷雾遮蔽的真相,还原对象的真实面目,这种逼近与还原在文学史重构的研究中尤显重要。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话题近几年被学者们屡次提及,在学界也掀起过不小的热潮。尽管人们重新审视文学史的标准不一,但认为旧有的文学史框架已成为一个僵化的学术体例已为普遍的共识,不少学者力图以全新的视野来观照文学史,在对文学史框架的重新调整中还原其本来的面目。这种

① 钱理群:《沈从文〈看虹录〉研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2期。

②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1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努力无疑将直接带动学术研究的进展,激活低迷的学术气氛。但是,由于旧有的文学观念的潜在影响,使人们很难在短期内摆脱久已定型的思维模式,往往在走出一个怪圈的同时,又极易掉入另一个预设的陷阱中。

无论是从社会学立场还是从启蒙立场去建构文学史,追寻的都是审美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的同构,作品表达的意义与历史进步一致时,地位便得以提高,而那些在当时疏离甚至是背离历史进步,但实际上反映了人类永恒性情感的作品则予以排斥。这种历史功利主义有其合理性,但失误也很明显,社会学立场强大的意识形态性和启蒙立场过于明确的目的性,都给文学史的建构加上了人为的硬性规范,所确立起的功利性标准给文学史复杂形态的还原工作带来诸多限定,很难廓清文学史的真实面目,损害了文学史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使本来多姿多彩的文学史表现形态日趋单一化、模式化。出现这种悖论式结果的根源就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未实现根本性的转换。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灵魂,“是特定民族在特定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下产生的生命意识、生存理想及人生信仰的积淀与凝聚。它渗透在该民族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并成为引领该民族发展前进的精神之光”^①。所以,价值观念的转换会带来社会心理形态的重大调整,并为旧的研究格局提供变换的契机。而人性研究的实质是价值研究,其成果必然导致价值观的重大调整,并带来深刻的观念性转换。这种转换将直接为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更为宏阔、更为科学的标准,并且对以往文学史研究模式造成一种强大的解构力,颠覆一些几乎已成为常识性的知识,一些已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理论框架将会被破坏。但无疑,这种人文价值评判标准的确立也将给文学史的重建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所形成的冲击波必将会冲破历史的迷雾,在消解已僵化的史学思维的过程中,恢复文学史的丰富形态,逼近文学史的真实面目。这种观念的调整造成的文学史模式的变动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作品的重新定位。作品是构成文学史的核心,对具体作品的评定将直接影响到文学史的构架。由于传统思维模式的限定,以往对于某些作家的作品定位带有很强的目的局限性,在浓厚的功利色彩笼罩下,一些内蕴丰富的作品被忽视了。而人文价值标准的确立,使这些作品开始浮出水面,包括某些以往被冷落的作家的作品和某些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大家的作品。前者如师陀的《结婚》,后者如茅盾的《蚀》三部曲。

^① 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第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对于师陀的研究,学界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 20 世纪的文学史不可能不提及师陀,但对他的关注也多集中在他的《果园城记》,而忽略了其他小说的研究,《结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结婚》是师陀很重要的一部作品,“仅就它的叙述技巧与紧张刺激而论,《结婚》的成就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①。小说结构安排巧妙,人物性格富于变化,而且心理描写极为生动传神。主人公胡去恶在正直忠诚的林佩芳父女与邪恶阴狠的田国宝、钱亨等投机者之间摇摆不定,追求精神的自足,还是倒向物欲的诱惑,使他陷入矛盾之中,最后他无法克制对物欲的渴求,完全堕落了,并最终被邪恶的势力吞没。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并未将胡去恶塑造为一个善良之辈,从本质上讲,他伪善、虚荣,如果给他机会,他也会成为一个像田国宝一样的投机者。实际上,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多置身于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对安逸享乐、金钱权力的渴求使他们钩心斗角、机关算尽,显现出一种盲目的愚昧,而战争则使得这种争斗更加尖锐酷烈。小说描写的这些争斗构成了人世间的残忍事实,极为深刻地展示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因为师陀能够在他紧凑的叙事中注入这点恐怖成分,他把《结婚》写成了一部真正出色的小说”^②。

关于茅盾的小说,以往大家更津津乐道于《子夜》,而对他早期的作品如《蚀》三部曲却关注甚少。《子夜》就其反映面之广、资料之翔实、结构之宏大等特点来说,的确是其他小说无法比拟的,但很明显,茅盾更多的是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理性眼光来构建这部小说的,感性成分的缺失导致《子夜》中对人物的道德、心理探索范围非常狭窄,未能真正激活他所占有的资料。而在《蚀》三部曲中,由于茅盾在思想上尚无法清晰把握社会各阶层的特点,导致他只能真实感性地记录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物的实际心路历程,而这恰恰增加了文本的意义含量。《幻灭》中静女士的理想一次次破灭的经历正反映出个人与强大社会现实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的悲剧意义。《追求》中则更以几个年轻人奋斗的失败说明人在命运前的无能为力,极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造化弄人”的主题。而《动摇》中与其说方罗兰是在政治上的犹豫不决,倒不如说他是婚姻家庭生活上的摇摆不定,妻子梅丽是传统旧礼教的代表,温婉、贤淑,却对未来充满疑惧,而深深吸引他的孙舞阳则活泼开朗,充满朝气和活力,却又时时玩世不恭,方就是在这二者的抉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464 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468 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择摇摆中显现出他既无法适应根深蒂固的传统生活,但又无法应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的复杂心理,在交错的矛盾中显现出丰富的人性内涵。

其次是对作家的重新审视,这与对作品的重新评定直接关联。如何给作家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定位是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它涉及能否真正还原历史的问题。试以鲁迅为例,鲁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领袖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其思想的深刻性、眼光的独到性、文笔的成熟性以及艺术表达样式的多样性,都是后来者无法超越的。但在以前的鲁迅研究中,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启蒙的视角出发,都将鲁迅及其作品罩上了“神圣”的色彩,具体表现就是:凡是鲁迅褒扬过的作家就予以肯定,而对那些曾与鲁迅发生过不睦甚至打过笔仗的作家便大加贬斥,这实际上忽略了对具体历史史实的实际考察。事实上,在1929年鲁迅思想转变之前,其一直是共产党人否定批判的对象,而最早称赞鲁迅的恰恰是自由派作家胡适、陈源他们。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号中对《呐喊》的激烈攻击代表了创造社作家团体的看法。郭沫若对鲁迅的恶感更是特别的闻名,他自称不能卒读《呐喊》这部小书。而与此相对应,胡适早在1923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特别举出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认为是新文学的佳作。陈源虽与鲁迅有个人积怨,但仍将《呐喊》列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十五部著作》中。而且,客观地分析鲁迅的作品,既应看到其不可超越性,也应看到鲁迅的某些作品存在的不足,如《狂人日记》中严肃道德意识未能真正的戏剧化,以及《阿Q正传》中前后风格色彩的不协调等,这是启蒙功利性诉求导致的后果,是鲁迅及其那个时代知识者所无法摆脱的历史命定。所以在研究中没必要有意回避这些缺陷,而应客观地切入历史,把握历史真实。再如郭沫若的诗歌,在当时确实是领风气之先,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而且在追求诗歌内在韵律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也应看到,他有些诗歌由于没有依着力而明显流于虚浮,尤其是他后期的诗歌作品,由于过于强盛的意识形态性,使他诗歌的艺术性大受损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相反,一些以前我们不太注意甚至不去提及的作家的作品,却因游离于意识形态影响之外而显现出别样的风姿,甚至有些作品超越了时代阶级的因素,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展示。沈从文对富含生命力量的人类淳朴纯真感情的追寻;张爱玲对人的存在深刻的生命体悟,对人的道德心灵的深层探索,展示人类透彻骨髓的“荒凉”意识;徐订在雅俗的交汇中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都显现出足以与其他优秀作家相媲美的才华,并且对激进主义思潮起到了历史制衡的作用。不论是从内涵上还是从审美上,他们的作品都深入到了生命的美学层面,为人性向最高层次的形而上做出有

力的延伸,从而成为20世纪的文学史格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上世纪80年代陆续出现的“张爱玲热”、“沈从文热”,直至最近人们对徐訏的关注,都说明他们的作品含有经久绵实的艺术魅力。毫无疑问,这种魅力的直接来源就是对人性的深刻表达。

第三是对作品意蕴的更多发现。在以往价值标准的狭隘取舍下,一些作品的丰富意蕴有意无意地被遮蔽甚至扭曲了,所以对作品内涵的重新发现,将是文学史重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文学史对郁达夫作品的评定,多是从个性的张扬、病态情感的显露、大胆的性描写等方面做出阐释,认为郁达夫的作品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反叛,尤其是对于性的描写更是对封建礼教形成极大的冲击。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他这种表面的背离却隐含着一种向传统回归的倾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还乡记》、《在寒风里》、《烟影》中的主人公在陷入颓废悲观的情绪中时,总是会提出要回家,这里的“家”具有象征意义,既是一种能给予自己心灵安慰的平静剂,又是化解痛苦的一种手段,真实地反映了五四知识分子背离了传统但又暂时无所依靠的普遍的精神状态。而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中则又蕴含着一种深沉强烈的忏悔意识。当女工二妹得知误解了“我”,请求“我”原谅她的时候,“我”突然想拥抱她,但理性却命令说: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资格的呀!”

这深重的自责中饱含着一种忏悔,在人类的悲哀和困苦面前,“我”的这种忏悔与西方的原罪意识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在对人类痛苦的本源的思考中具有终极意义指向,同时“我”心中的欲念也在这种思考中被净化了。

而茅盾的《虹》的意蕴则更为丰富,人物心理的展示更为微妙,尤其是对于梅女士与其丈夫柳遇春的情感描述极为生动。在五四新文化的浪潮中,的确有不少妇女为了追求婚姻恋爱自由,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从旧家庭冲了出来,曾有大量的作品去表现这些勇敢的“娜拉”。但是不可否认,在后来对这种题材的表述中,逐渐形成一种格套:贪财的父亲、横蛮无知的丈夫、女子的悲惨处境与英勇反抗等皆成了这类故事不可缺少的情节因素。《虹》对这类题材却未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在夫妇的矛盾纠葛中寻求一种复杂心理情感的表现。梅的确是在父亲的包办下嫁给了她并不喜欢的“苏货铺”老板柳遇春,柳本人尽管目不识丁,但也有追求幸福的本能。他自幼父母双亡,被梅的父亲收养,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才由一个学徒成为一个老板。更为重要的是他爱梅,为了获得梅的爱情,他极尽体贴。柳遇

春的这种良苦用心使梅极度矛盾,她具有反叛的个性,但作为一个女人,“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都像韧丝,将她紧紧裹住,使她无法破壁飞去。虽然她在与柳的冲突中占尽上风,但她无法克制自己女性的本能,在与柳分居一段日子后,心情烦闷的她竟在不自觉中走到柳的房门前,与柳重归于好。但梅毕竟是个受过新思想洗礼的女性,她渴望获得自由呼吸的空间,这决定了她必须摆脱柳遇春,为寻找反抗的理由,她不得不在柳身上寻找一些微不足道的缺点来强化对柳的憎恶。这些微妙心理的展示,不仅使梅这一形象显得活灵活现,而且对人类某种与生俱来的情感做出了深刻的透析。

实际上,中国并不缺乏人文主义思潮,像在五四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都蔚为壮观,但可惜的是都在未成熟之际便中断了,究其根源,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缺乏人文关怀,具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儒家传统对人的本性的压制力量是无比强大的,“礼”的确立冻结与僵化了人的自然性情感,剿灭了人的个性发展机会。所以,尽管在某一历史阶段会出现人文思潮,但往往会因为没有坚实的生长土壤,只能在短期的辉煌后便被这样或那样的力量打断了,像五四人文主义思潮是被功利性的救亡政治打断,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又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夭亡,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发展不同。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开始“走向人”,“走向自然”,探讨人的本质,呼唤对“人性”的尊重,重视个体生命的独立价值,并推动了艺术家对人生与生命的思考。而且这种人本主义思潮发展起来后,会迅速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在得到充分发展后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所以,西方的人性发展有着坚实的基础,并且是在有序的递进中走向深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对人性的研究必定会成为主潮,在人文理论的发展中,人对自身的认识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人文主义关怀也将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历史洪流中的遗憾与尴尬

——试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局限

五四启蒙思潮是对近代启蒙思潮的接续,但五四的知识分子比他们的前辈走得更远,他们在对封建纲常礼教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中,希图完成上一代知识分子所未竟的事业,那就是改造国人的灵魂,唤起民族自新的力量,重铸民族精神。这种诉求使他们将启蒙的旗帜举得更高,在他们心目中,启蒙甚至成了一种神圣的使命。然而这种被寄予厚望的启蒙尽管在历史的大转折中曾有过极大的影响,但由于其是受启发于欧洲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这些思想在被移植到中国后,却面临着难以协调的中西文化传统的矛盾。这一矛盾一直困扰着五四的启蒙者,使他们在启蒙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并时时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最终使启蒙运动实际取得的成绩与当时启蒙者的期望产生了很大的落差。综合考察五四启蒙思潮,会发现其局限性主要集中在历史观念的狭隘、主体价值的失落、文学审美的消损等三个方面。

一、历史观的狭隘

五四启蒙者们历史观的形成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支撑的。自从严复将赫胥黎的《天演论》译介到中国后,进化论便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并且被广泛接受,可以说,绝大多数五四知识分子都受到过进化论的影响。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说,他名字中的“适”字便是取“适者生存”之义。而在五四引起过轰动效应的文章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都是以进化论为主导理念的。

进化论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中获得广泛认同是与当时的历史现实密切相关的。鸦片战争后,中华大帝国的美梦被列强的大炮打碎,并迅速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中。在这种历史的巨大变动中,一批先觉的爱国知识分子悲壮地扛起民族复兴的重任,自觉而痛苦地追寻着富国强民之路。而进化论所标示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观念恰好契合了当时人们渴求革新的愿望,所谓“民物竞存,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

强肉，愚者当为智役”^①的观念在当时相当普遍，它不但可以消除当时人们普遍的悲观情绪，甚至可以支撑起中国能够迅速富强并称霸世界的认识。五四知识分子将这种观念直接应用到了文学革命中，宣布传统文学已经过时，并已成为时代的阻碍力量，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对其进行彻底的革新，从而大大加速了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步伐。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五四启蒙运动中，这种进化论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被庸俗化了，对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热切渴望使启蒙者们将这种历史观化约为历史的单向突进，从而获得一种虚幻的乐观与廉价的粉饰。这种局限直接影响了启蒙的有效性，并使启蒙命定的成为一种乌托邦理想。

进化论最早是由达尔文提出的，主要是应用于生物进化的规律，后来才扩而广之，发展到社会政治等其他领域。它认为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新兴的事物必然要取代旧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更替中向前发展。但是，人毕竟不同于生物，人是有思维的，所从事的精神生产要远远比生物的活动复杂，所以进化应有“天然进化、人事进化之别”，“人事进化与天然进化有相因的，亦有相反的也”^②。单纯地认为新的必战胜旧的只会造成对历史的简化，从而使历史的复杂形态遭到遮蔽，而且也极易落入新（西方的、先进的）旧（东方的、落后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实际上，新旧事物的置换，从历史的局部来讲，是一种取代，但从历史的发展整体来看，新兴事物的诞生，更多的是对旧事物的一种补充或从另一角度的发明，由于其侧重点及立足点不同，所以导致出现差异，而这种差异正好构成历史的整体性认识。

而且，进化论历史观本身的理论建构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它二元对立思维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本质一元论。它是一种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在向单一的维度发展，这就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排斥了构成历史的其他力量。渐为学界所重视的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柏林就极力反对这种带有“特殊神宠论”色彩的一元论和目的论历史观。他从多元的文化历史观出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单一向度的活动或者编制一种特定的等级体系，能够限定人类发展形式的多样性。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多种力量，它们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共同构成对历史的

① 严复：《严复集》（第1册），第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4～38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